

期望梁振英協助中產專業界解決內地執業困難

楊志強 哲學博士 資深時事評論員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志強時評

繼與香港銀行界及「五大商會」會面後，候任特首梁振英會見專業界別人士，帶出中產專業界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訊息。期望梁振英和新一屆政府從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和困難入手，由不同專業界別人士提出各自的訴求，協助專業界解決內地執業困難。同時，期望梁振英未來在整體施政上力求政策照顧平衡，創造有利於中產專業人士生存和發展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而一個由中產階級佔多數的社會，一般總是相對穩定又保持進取精神的社會。

梁振英與專業界別代表，包括香港律師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醫學會、工程師學會、會計師公會等共11個專業團體代表會面，當中包括梁振英參選行政長官時的競選辦副主任、專業聯盟副主席劉炳章。事實上，專業聯盟的發起人和主席正是梁振英本人。梁振英在會上主要聽取了各團體有關香港專業界在內地發展遇上的困難，表示會盡力協助專業界解決困難，例如將專業界在CEPA 落實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待他上京接受任命時向中央反映，協助專業界進軍內地市場。梁振英將於今日上京接受任命，業界期待他將帶來好消息。

內地專業服務市場「大門開小門未開」

李克強副總理去年訪港提出「挺港36招」，大幅提升內地對香港服務業及貿易開放，加上CEPA補充協議八簽署，香港服務業北上將掀起新一輪高潮，目前本港專業團體對更好地利用CEPA已有紧迫感，並且積極利用CEPA推動營商的行動中。但是，本港不少中產專業人士仍然面對內地市場實際仍存在「大門開，小門未開」的情況，使他們在內地拓展業務時面對一定困難，包括：本港中產專業人士於內地的註冊、開業、執業手續上仍遇上不少困難及限制，國家稅務總局訂下的法規在不同城市會有不同的詮釋，內地某些城市的公司註冊和資評定的門檻十分嚴格，兩地的專業資格互認進展欠理想，等等。這些因素，給香港專業人士到內地執業帶來法律上、經營上的障礙和風險。

香港專業人士在內地發展遇上的困難原因複雜。首先，香港與內地專業服務在制度和專業操守方面的差異很大。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內地專業服務開放得最遲，到現在內地很多專業仍未脫軌改制，很多專業部門仍然是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內地要發展專業服務，就要將技術、制度和職業道德水平三者結合起來。香港過去百多年的經驗可以作為借鏡。其次，是保護主義的問題。中央政府下達政策，地方政府執行，但往往由於保護主義，地方政府對CEPA 條文會有不同闡釋。加上內地專業人士與有關政府部門關係密切，對香港專業人士在競爭上造成不少障礙。

從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和困難入手

推動和鼓勵香港專業服務人才積極參與內地發展，豐富和提高國家整體專業服務提供者的數目和質量，這既是國家的需要，也是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不可或缺的進程，能夠在多個領域加快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強化香港專業服務的優勢和功能。梁振英協助專業界進軍內地，需要在促進內地專業脫軌改制的同時，也促進地方政府放棄保護主義，這對梁振英是很大的挑戰。可行的辦法，是從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和困難入手，由不同專業界別人士提出各自的訴求，好讓梁振英設法幫助解決困難。據悉，梁振英已要求專業聯盟提交訴求的報告，以便他向中央反映，他亦會按實際情況，在未來12個月滿足有關訴求。

例如，律師會前會長、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主任王桂壘透露，法律界希望與內地律師以合夥式聯營內地辦事處，第一步是在前海實行，而未來會在珠三角先行先試，並容許香港事務所聘用內地律師；醫學會副會長周伯展表示，雖然CEPA 有利香港醫生回內地執業，但仍存在「小門未

開」的問題，建議香港和內地設立統籌部門，確保政策切實執行。諸如此類具體訴求，由梁振英向中央反映，可望逐步得到解決。

帶出中產專業界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訊息

梁振英會見專業界別人士，帶出中產專業界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訊息。香港中產人士對社會付出的多，取回少。香港的中產階級是香港的稅基或納稅主體。香港37%的交稅人口中，大部分為中產階級。全港360萬勞動人口中，收入最高的50萬人，繳付的薪俸稅佔政府薪俸稅總收入的近九成。拍賣土地的收入是香港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高地價導致高樓價，最終由中產階級購買和承受。中產階級成為政府庫房賣地收入的間接提供者。

香港中產階級是介於社會高層與低層之間的緩衝層，當它成為社會主體時，社會高層與低層之間的衝突就會受到阻止，社會矛盾就會大大緩和，這是社會穩定的政治原因。只有維持一個穩定和充滿自信的中產階層，香港經濟才會暢旺，就業職位才可能大量增加，市民收入才有希望上升，香港的安定、繁榮與和諧才有保證。

梁振英在上任後的首份施政報告，將擊劃新政府未來五年的施政藍圖。梁振英通過與專業界別代表會面接觸討論，不僅有助全面構思首份施政報告，而且有助於下屆特區政府高度重視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利益和訴求，協調各階層的利益矛盾，力求政策照顧平衡，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中產階級進一步興起，這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和諧的必由之路。

田園快語

烏溪沙具生態價值不宜填海

田北俊

理性看待最低工資檢討

顏文羽 觀塘區議員

政府提出「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的諮詢期在上月底結束，諮詢重點是希望為本港未來的土地儲備，作出策略性的規劃。文件當中提出的六大土地供應模式，包括在維港以外，作出25個考慮用作填海的選址，便招來極大的迴響。因為在填海考慮選址中不乏深具自然生態價值，又鄰近民居的地點，根本不適合用作填海之用，如新界東的沙田馬鞍山的烏溪沙便是最佳例子。

烏溪沙是香港後花園

對於當局提出，為了增加本港土地的供應，打算在維港以外適合的地點進行填海，表面上是沒有反對的理由。問題就在於具體選址上不乏爭議的地方。以馬鞍山的烏溪沙海灣為例，因其本身有獨特的生態保護價值，根本一早就應該放入選址之內。

也許政府的官員習慣了在辦公室內決策，不太了解前線的問題。因為只要到過烏溪沙看一看，都會感受到其獨有的天然美景。而這一個，更早已獲國際認同。在2010年，烏溪沙海灣便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選為香港觀賞日落最浪漫的地方，故經常吸引不少攝影發燒友到當地拍攝沙龍相。

此外，烏溪沙一向都是本港市民的后花園，更是沙田區內碩果僅存的天然海岸線。在經過多年的規劃後，該處已發展成為一個完善的公共休憩空間，附近設有海濱長廊、單車徑及烏溪沙碼頭等設施。加上位處民居附近，交通便利，每天都有大量的市民前往散步休息，可說是載滿香港人，特別是馬鞍山居民的集體回憶。

區內市民反對填海

所以，當政府提出要在烏溪沙海灣進行

30至99公頃填海時，馬鞍山區內，甚至全港其他地區的居民都齊聲反對，不願見到烏溪沙的自然美景受到破壞。而且，漁護署本擬在烏溪沙海灣所在的吐露港設立漁業保護區，亦反映出該區具有一定的生態價值，不適宜作填海之用。

有見及此，我在馬鞍山的地區服務處及馬鞍山權益力量由二月起，便於馬鞍山區內發起收集簽名和市民心聲行動，更收集了逾五千個市民簽名，反對在烏溪沙填海，可見市民反對的聲音是十分清晰的。

為了表達我們反對在烏溪沙填海的決心，我們在「優化土地供應策略」公眾諮詢結束當日，便在區內發起了一項名為「反對烏溪沙填海大遊行」的活動，並有接近400名馬鞍山居民響應參與，要求政府聆聽居民心聲，將烏溪沙從填海可能選址中剔除。

事實上，除了烏溪沙外，其餘24個可考慮填海的地點中，另有5個填海選址也位於新界東，包括了大埔工業邨、大埔滘、船灣，及將軍澳131區及將軍澳東，因各自有獨特的生態保育、環境及交通運輸配套等因素問題，都不宜納入填海計劃。例如大埔工業邨、大埔滘及船灣三個填海可能選址附近，都有重要的生態環境或養魚業存在，而將軍澳區人口目前已達40萬，密度極高，若在區內進行大規模填海，並增加人口，只會加重本來已十分緊繃的社區及交通設施的壓力。

所以，我認為這5個選址，與烏溪沙一樣，都不適宜用作填海之用。我相信政府在諮詢期內，應該聽到了不少反對的聲音，希望屆時能一併剔除於最後的選擇之外。至於政府在其他地區進行填海時，亦必須仔細研究選址是否合適，會否構成生態問題或對附近的居民構成負面影響。當局必須在通盤和周詳考慮之後，才可作出相關決定。

便難以以同一薪酬(最低工資水平)去聘請勞工，令這些屋邨屋苑的保安清潔每況愈下。

第四，通脹被進一步推高。最低工資的落實，令基層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費亦自然會跟隨有所增加。加上，企業亦將最低工資令生產成本上升的某部分轉嫁予消費者。在飲食業及管理費的收費上升是這方面最為明顯的例子，亦因此這些行業最受最低工資條例的影響。

最低工資設立是為了保障基層勞工的生活。香港亦要為此付上代價，例如失了某部分市場調節的靈活性等。若最低工資調得太高，香港的勞工市場便會處處受制。

香港是需要理性的討論及判斷，口號式的要求政府調高最低工資水平是華麗漂亮的，是得到別人的掌聲的。但掌聲背後，香港整體社會是需要付上成本的。一旦面對經濟不景氣，勞工市場亦處處受到限制，香港社會將會失去一個自我調節的功能。我們不能因一時經濟的好景，而去盲目脫離設立最低工資的政策目標。

筆者希望最低工資委員會可以設立一個調整最低工資水平的機制，每年按機制或方程式內的數據改變，去調整最低工資的水平。香港社會需要客觀理性，設立機制及方程式，可免去香港社會的內耗和討價還價的爭辯。

爭取調整時薪與標準工時宜分階段進行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今年的勞資關係面臨頗大的考驗。勞工界團體提出的有關訴求，尤其是最低工資時薪調升和標準工時立法問題，最好分階段進行，切忌急於一時，應該讓資方有時間「回氣」。否則，隨時弄巧反拙，令資方感到「一單未完又來一單」，大有頂唔住的感覺。

每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後，似乎都成為香港勞工團體爭取訴求，舉行遊行的日子，今年也不例外。綜合起來近期勞工團體提出三個大項重點：一是檢討最低工資，由時薪二十八元調升至二十九元至三十五元；二是要求政府制定標準工時；三是要求規管勞工超時要有「補水」的監督機制。以上三大權益訴求，不免引起各界的深切關注，尤其是商家老闆，想必定會反對和擾攘。

爭議近十年的最低工資立法已於去年五月一日實施，至今已近一年時間。立法之時已有協議每年檢討一次，近日有關方面也公布進行七個星期的諮詢期，主要是聽聽勞資雙方對實施一年之最低工資意見，然後作出適度調整。

調整最低工資不要影響勞資和諧

從最低工資的運作情況來說，反應比預期想像中還要好。對資方而言，沒有他們憂慮的那般悲觀，沒有出現倒閉潮，相反生意照樣做得紅紅火火，一點不受最低工資實施影響。

對勞工階層來說，尤其對「三低」行業的勞工來說，當可受惠。在受惠之餘又不影響就業，這是最難得的。美中不足的是，物價不斷上漲，又逢許多公營機構如巴士、港鐵、兩電等宣佈加價，抵銷了時薪二十八元的加幅，人工追不上通脹，大有回到起跑點之感。

有見及此，勞工界團體如工聯會等提出檢討去年定出的時薪二十八元的水平，要求將時薪調整在二十九元至三十五元，以彌補通脹帶來的侵蝕，減輕勞工生活負擔。從這個角度和理由來說，勞工界所提的訴求有道理。問題是時薪調整的幅度究竟多少才會令資方能夠接受？關鍵就在這裡。加一元對勞工幫助不大；若加七元，資方當然不會貿然接受。看來勞資雙方必有一番角力，難免出現一番「拉鋸戰」。惟盼不要由此引起「針尖對麥芒」的情況，影響社會和諧。

標準工時影響更廣更大

至於勞工界團體提出的制定標準工時問題，同樣會引起資方老闆關注和緊張。制定標準工時帶來的影響，若

從涉及的行業和受薪階層來說，大抵比最低工資較大較多。因為最低工資立法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幾個低技術行業，人數只在四、五十萬基層勞工，而制定標準工時，可能包括全港所有行業和所有受薪階層。

必須一提的是，標準工時指的是每日工作八個小時或者以每個星期計算，如何釐定，如何作準，現在來說普遍存在一種情況，就是雙方合約定明每日八小時或九小時工作，即使超時工作，一般資方都不作「OT」補水予員工，認為超時工作只是員工所負責的工作沒有完成而已，政府對此沒有作出規管，員工只能無可奈何。因此，勞工團體要求政府制定標準工時，以保障工人法定工時工作是合理而必要的，工作超時得到「補水」乃是公平交易。但在制定標準工時後，一旦資方因「趕貨」要求員工加班又按法例補水，員工究竟如何面對？願意加班當然不成問題；若不答應，會否受到資方處罰或解僱，值得考慮和探討。有勞工團體認為一旦制定標準工時，無論資方如何要求，員工都不應甚至不能去做超時工作，這種做法也值得商榷，尤其是經濟興旺，勞工人手短缺的時候，最好不要硬性規定，建議讓員工自己決定，這對雙方都有好處。

美澳聯盟擾亂亞太戰略均衡

張敬偉

4月3日晚上，在夜幕的掩映下，一隊200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乘飛機抵達澳大利亞北部城市達爾文。這意味著，去年年底奧巴馬總統訪澳時與澳總理吉拉達達成的美國在澳大利亞駐軍的協議開始付諸實施。按照這一計劃，未來6年美國將在澳大利亞的達爾文市駐軍2500人。

這同樣意味著，美國首次實現南太平洋駐軍。這可視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一部分，也可視為美國在東亞軍事戰略部署的擴大。眾所周知，在東亞地區，美國在韓日兩國擁有軍事基地，也曾經在菲律賓擁有克拉克和蘇比克兩個軍事基地（後為菲律賓政府「請出」）。美在澳駐軍，恢復了上個世紀美國在東亞的軍事戰略佈局，而且在南海島嶼主權衝突的形勢下，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有重新請美國駐軍的意願。因此，觀察家們難免會對美澳駐軍產生更多聯想，將之視為「亞洲北約」控制亞太區域的重要棋局。

組建「亞洲北約」的重要一步

即使是美國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在4日的報道中，就稱「在澳大利亞部署的首支海軍陸戰隊，將在中國『戰略後院』增強美軍存在。」澳大利亞防長更是直言不諱：「如今的世界需要實質性的應對中國的崛起、印度的崛起，應對它們的戰略、政治及經濟舉措給我們帶來的影響。」稱這是美澳6年同盟中具

有歷史意義的一天。這和去年年底吉拉達德總理的宣示顯然不同，她當時認為美國是盟友，中國是朋友，認為美國在澳駐軍不會影響中澳關係。現在，她依然「溫和」，只是稱澳洲不會允許有美國軍事基地。可是，美國駐軍和擁有軍事基地其實並沒有根本性的差別。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於美國在亞太的軍事佈局，已經脫敏。可是，澳洲防長直言針對中印兩國，卻可能在亞太掀起滔天波瀾，這說明美澳聯盟打破了亞太區域的戰略均衡。

在美國重返亞洲的策略中，印度也是抗衡中國的一個支點。近年來，印度也從印度洋東進，挺進東南亞，和美國、東南亞各國舉行聯合軍演。而且，東南亞國家基於大國平衡的需要，也希望在亞太的地緣戰略棋局中引入印度。可是，澳大利亞防長的言論，可能會讓印度大吃一驚。自稱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事實上也未必是美國真正屬意的朋友。而這，從「冷戰」時期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連橫合縱博弈中，亦可循跡到美國利益至上而無永遠朋友的規律來。聯想到美國在伊朗石油制裁中，並未對印度給予歐日那樣特殊的待遇，亦可窺出端倪。面對印度的崛起，美國同樣會有忌憚之意。

美澳深化同盟 東南亞感不安

何止印度，在地緣政治中，和澳大利

亞更為接近的東南亞各國，特別是印尼，恐怕也會感到強烈的壓迫感。美澳超過60年的同盟關係，不僅基於兩國在歷史上同文同種的大不列顛背景（兩國歷史上皆為大英帝國殖民地，都說英語），而且在「二戰」中還結成了鮮血凝成的友誼。在「冷戰」時期，澳大利亞也是亞太緊隨美國的鐵桿朋友。尤其是在9·11之後，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英國首相貝理雅都是小布什總統最親密的反恐盟友。為了配合美國的先發制人，霍華德總理也因為東南亞的「回祈團」（和基地組織有關聯）對東南亞鄰國發出了「先發制人」。這引起了印尼、大馬和新加坡等鄰國的強烈反彈。可以這麼說，一直到霍華德時代，澳大利亞都是以歐洲國家和基督教文明為豪。

美國在澳大利亞駐軍，除了引發中印兩國的不滿，恐怕還會讓東南亞的印尼、大馬等國不爽。尤其是印尼，美國駐軍的達爾文市離印尼的直線距離只有800公里，這對美國干預印尼和東南亞提供了大大的便利。

因此，如果說美國重返亞洲制華的戰略佈局，會讓周邊國家充滿期待。美國在澳大利亞駐軍，則讓東南亞各國不安。讓中國不爽、印度不滿、東南亞不安，美國在澳大利亞駐軍可謂擾亂了亞太區域的戰略均衡。美國還能擔當得起亞洲的領導者嗎？